



中國文學在俄國——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上半葉(下)*

李 福 清(B. Riftin)

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

65-70

1834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文集“*Novosel'e*”(新居)是當時知名作家的文集(如普希金·果戈里提供了自己的新作)。第一部作品是O. Senkovski寫的，題為“Ch'ing ch'ung”(作家的榮耀)的中篇小說，這純粹是俄國作家虛構的作品。O. Senkovski(辛柯夫斯基，1800-1858)是當時有名的小說家、評論家及彼得堡大學的教授，是傑出的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專家，並旁涉其他的東方語言。他的妻子在回憶錄裡寫道：「他在執教的同时，自己還勤學不輟，好幾年他都將時間用於學習他還不懂的語種。漢語、蒙語、滿語、藏語、冰島語幾乎佔據了他全部的時間和他全部的思考。」⁹

1832年，辛柯夫斯基自己寫道：「漢語佔去了我無數個日日夜夜，現在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漢語了。」¹⁰據知，辛柯夫斯基首先倡議在彼得堡大學創辦漢蒙語文部，還在1829年向學校管理委員會交了一份專門申請，提出在學校裏設立「特別完備的東方語言班級」，其中包括漢語和蒙語¹¹。他的一位研究波斯語、阿拉伯語和土耳其語的優秀學生P. Kurljancer(庫爾梁采夫)在1829年請求前往北京學習漢語一事，辛柯夫斯基很可能從中鼓勵促成。正是這個庫爾梁采夫把《紅樓夢》的一個珍本手抄本帶回了俄國，該抄本在1986年由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出版，並在中國學者中引起了強烈的興趣。¹²

因辛柯夫斯基對中國話及中國文化有興趣，所以可以想像他寫中國題材的小說不是偶然的，作者在“Ch'ing c'hung……”序言中說：「文集編輯請他寫有關戀愛及文學創作兩個題材有關的作品。」辛柯夫斯基說他打算講述「某一天在北京報紙上看到的故事，因為他每個星期天早

飯之後看《中國通報》。」

故事是這樣的：這個事情發生在清朝乾隆年間，也可能早一些。在北京有一個青年人名叫Ch'ing Ch'ung，他喜歡一個小姐叫Ch'ien Chin-chun，因此寫了一篇賦歌頌這位小姐修長的指甲，登在京報，讀者都很欣賞。因Ch'ing Ch'ung特別喜歡榮耀，他買了很多書，整天閉門在家讀書，後來他編了一本又一本的書，並不斷地得到榮耀。他的一個伯伯(或舅舅)是當時有名的學者，後來對他不如以前那樣好了。他又寫什麼新的作品，一方面得到榮耀，另一方面有不好的影響，如老友怕與他交談，有名的友人當面稱讚他，背後卻在北京報紙罵他。忽然，有一天他覺得自己喜歡榮耀勝過喜歡那位小姐，他名滿天下，以至老遠的廣州都知道他；他作品的一頁紙包著茶葉甚至到了歐洲，他的名聲也越多。後來他去見小姐，要與她結婚，小姐因敬佩榮耀的人，同意與他結婚。但那時Ch'ing Ch'ung見到小姐窗下有一個北京的花花公子在那裡踮踮，Ch'ing Ch'ung叫兩個人用棍子去打這個公子，公子丟落帽子，待拾起來一看，裡面有小姐的一封信，信中說她並不喜歡Ch'ing Ch'ung其人，但喜歡他的榮耀，所以要跟他結婚。Ch'ing Ch'ung看信之後憤而告辭，意思是榮耀並不等於幸福。

當然，這位俄國作家純屬虛構的小說與中國文學無關，描寫的背景與風俗也不大像中國的，並不是作家不熟悉中國情況，他看了很多書，寫了不少關於中國書的書評(如關於Bichurin的書)，但是他故意要寫一部有很多西方幽默及諷刺味道的小說。

好多年後，他又寫了一部中國題材的中篇小說，放在

* 續 本刊13：1(總49期)頁12-16 中國文學在俄國——十八世紀～十九世紀上半葉(上)

9. A. Senkovskaja. “*Osip Ivanovich Senkovskij*” (Baron Brambeus) , 聖彼得堡, 1858, 第14頁。

10. P. Skachkov. “*Ocherki istorii russkogo kitaevedenija*” (俄羅斯漢學研究史綱), 莫斯科, 1977, 第133頁。

11. 同上, 第190-151頁。

12. 《石頭記》，蘇聯列寧格勒藏抄本，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他1858年出的文集裡。題名為〈女中佼〉，小標題則是「中國軼事」。

作者在小說中寫道：「本書所寫人物、故事，乃至選用語純為中國所有，書中所述種種，均有中國歷史、小說、曲劇原本或到過中國的西洋人所寫的筆記可據。」這部標明1845年的作品，其實並非一部單純創造或純翻譯的作品，而是對〈好逑傳〉的創造性藝術加工。該書正如上面提到過的，早在1832年就有了從法文翻譯的俄文全譯本，而足資證明這是一次創造性加工的，首先是俄文作品用了原書中主要人物的名字：俏佳人冰心，青年公子鐵公（應為鐵公子）。

辛柯夫斯基把故事移到和他差不多同時的中國清朝道光年間，即1839年，主人公鐵公還不到二十五歲。書中女主人公不是濟南府大官水居一的女兒，而是當時有名的政治風雲人物林則徐的女兒。在此同時，辛柯夫斯基在書裡卻保留了中國原小說裡的許許多多細節：男主人公生性桀傲不馴，為此老父遣他去故鄉居住，使遠離京城，他卻擅自返回，途中投宿一貧窮婦人家。也像〈好逑傳〉裡那樣，該婦人告訴鐵公關於魏秀才的新媳婦被一位大官強搶之事。總體上，辛柯夫斯基的書裡的情節展開也大致像中國原書裡一樣，他揭露那些當官的穢行，加進了好多看來是他自己構思出來的有趣的細節，例如皇帝派遣的清官欽差，卻有專門的賄官為貪賄，用鏢行保險名義來索取賄賂，再用錢向欽差大臣捐官，這收羅來的賄金正好充了這筆開銷。辛柯夫斯基還構思了好多在中國原本裡的情節線索，例如鐵公子被捕入獄，那個貪官竟要判決鐵公娶他案吏的堂妹，一個醜女人為妻等等。把小說的時間移到了道光年間，使書裡提到了「令聲名卓著的林大人被派到廣州除害，取締鴉片走私，將外國客商趕出廣州，這斷然之舉是和西洋鬼子開戰之起因」云云。¹³書中借一個人物之口說：「西洋鬼子的龐大火船開進了北直隸海灣，幾乎直抵北京城下」，¹⁴1840年英國艦隊確實駛進距北京很近的北直隸海灣，此事有史實可查。

辛柯夫斯基小說的結尾是患病的鐵公住進了林府，俏佳人冰心答允照顧他，鐵公對小姐一見傾心，後來的情節讀者無從得知。小說在這裡打住，結尾處交代道：「我們面臨一個複雜的故事，此處已不遑敘說。我們正跨在中國的『冤孽情障』的門坎上。普天之下，所謂『冤孽情障』萬般

苦惱，也正是您墮入情網，為情所繫，娶妻成婚只在一念之間的時候。此時更有什麼萬般苦惱？為何還會絕望？為何要將此等愛心視作冤孽情障？您定會驚訝莫名，疑竇叢生，其中奧妙何在？這也就是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且聽下回分解」。在這些話之後有一個編者的說明：「作者有意在續作中描繪中國人當代生活的生動畫面，可惜尚未寫成。」¹⁵很難斷定這些話真是出版者所加，還是作者自己所寫，小說之所以突然收筆，也可能是因為作者並未去過中國，故要描繪當時中國的日常生活，並非輕而易舉的事。

據知從1834年起辛柯夫斯基曾一連多年擔任《讀書叢刊》雜誌主編職務，並在刊物上發表自己的作品。因此，不能排斥曾刊登在刊物上的〈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國人〉，或〈十二串珍珠項鍊〉的中國故事¹⁶，正是出於他的手筆。這一故事並非是從中文翻譯過來的，但無可爭辯的是俄國作者在寫作時，利用了中國文學的情節故事。這篇作品講的是某一個恪守中庸之道的南京仕人、私塾教師羊清明，某日，有一位不知名的僧人突然來到羊清明的私塾中，擅據教席並開始考問學生，後來他在十二張紙上各寫上四個字，命羊清明解釋每句意思。私塾老師對每張紙都用一個二十四孝中的故事來解釋（例如孝感動天、老萊娛親之類），這樣，羊清明就講出了這稱作為十二珠鍊的各句意思，這位嚴厲的高僧原來是當今皇上的兄長，並且是翰林院主考。這時他要求羊說說第十三珠鍊的意思，羊對此一無所知，僧人就指羊本人，因為他二十年如一日為他失明的母親引路，以至老太太甚至忘記了自己是一個不見天日的人了。正是因為這點，和尚才要他再說出一鏈（亦即第十三孝珠鍊）。

除了那些根據法文或英文譯的話本及章回小說，以及從中文譯的〈好逑傳〉片段與偽造的中國小說之外；19世紀上半葉還有人發表了他譯的《紅樓夢》第一回前一段的俄文翻譯。彼得堡刊物“Otechestvennye zapiski”（祖國紀事）從1841年第9期至1843年第4期連續發表署名為De Ming的〈中國旅行記〉，很多年來，俄國漢學家都不知道這個De Ming是什麼人。幾年前筆者才發現這個用中國姓名做為筆名的人，是一位俄國礦業工程師A. Kovanko（1808—1870），1831年俄國政府派他到北京學漢語並調查自然礦藏。來到北京（他與俄國傳教士團一起去北

13. “Sobranie sochineniy Senkovskogo”（辛柯夫斯基文集），聖彼得堡，1858，第五卷，第162頁。

14. 同上第163頁。

15. 同上第170頁。

16. “Biblioteka dlja chtenija”（讀者叢刊），1843年，第58卷，〈雜事欄〉，第70頁。

京)，他見自己一個人不可能作什麼礦業野外調查，於是盡力學漢語。那時住在北京的俄國人都用《紅樓夢》作語言讀本，Kovanko譯了第一回前一部分附在他的《中國旅行記》第九篇文章的末尾（《中國旅行記》共寫了十篇），這是西方最早的《紅樓夢》的部分翻譯。《紅樓夢》不僅以其生動的話語引起了Kovanko的注意，而且還作為一部特殊的中國生活百科全書，使他深感興趣。

回國之後，1837年，他在「致礦業工程師協會總部主席的彙報」中寫道：「正如我注意必要的項目（著者注：指礦業、農業等）一樣，我在同樣的程度上被中國人的習俗所吸引。為了更多地了解這些習俗，我讀完了《紅樓夢》四大函。書中極為精彩地描寫了中國人的家庭生活方式，節慶活動，結婚和喪葬的禮俗……，這部書譯成俄文一定會受到希望了解中國習俗的人的極大歡迎，並使有志學習漢話口語的人獲益匪淺。因為這部書是用純正的口語寫成的。」¹⁷可惜沒有人注意他的呼籲（當然，礦業專家不會對《紅樓夢》的翻譯有興趣）。《紅樓夢》的全譯本是1958年才在莫斯科問世的。但俄國那麼早就有人提倡要翻譯《紅樓夢》，是很值得注意的事。

如果談到中國戲曲在俄國，那要說最早的消息是1829年6月號的刊物“*Atenej*”（第11期，第453-457頁）上曾刊有兩齣元曲的故事大概：即關漢卿的《竇娥冤》，在俄國刊物上的名稱是《秀才之女沉冤昭雪》；以及相傳為曾瑞卿作的《留鞋記》，故事題名為《元日春夜遺鞋記》。附註裏說該兩劇均取材於“*y'üan jen chung*”（元人〔百〕種〔曲〕），看來這是某一本元曲集的訛名，多半是英文的音譯。該劇之所以取名為「秀才之女沉冤昭雪」，使人不禁產生一種看法，即這個梗概是基於一本英國人G. T. Staunton著的“*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mbassy to the Khan of Tourguth Tatars in the Years 1712. 13, 14, 15,*” London, 1821, pp.243-246（The Student's Daughter Revenged），¹⁸可能第二個劇情就是取材於此。雖然在M. Davidson的書目裏曾經指出第一個梗概的法文譯者名叫巴贊，在“*Journal asiatique*”（亞洲學雜誌）上發表時已是1851年了。¹⁹這是第一次在俄國介紹中國戲曲的內容，後來情況不一樣。

1835年聖彼得堡出了一本題名為《旅行者》的書，Skachkov及其他書目都說這本書是「中國的中篇小

說」。但是從來沒有人研究過到底是什麼樣的中國小說，為何題名為「旅行者」？Skachkov在1932年所出版的《中國書目》第一版中註明，據譯者Z. Leontievskij稱，這部小說在1710年譯成了滿文，一直是漢族與滿族人最喜歡的讀物，小說描寫的是9世紀的風俗習慣（Skachkov Op. cit, 第967頁）。譯者Leontievskij（列昂吉耶夫斯基，1799-1874）是俄國漢學家，從1821至1831年在北京學漢語與滿語，精通兩種語言，好多年都在編《漢滿、俄辭典》（現存手稿二千頁），並將當時有名的俄國歷史學家N. Karamzin寫的《俄國史》三卷譯成了中文，中國政府把他封為「國史」（國師？）。

《旅行者》出版之後的第二年，即1836年，彼得堡當時流行很廣的刊物《讀者叢刊》，發表了一篇簡短的評論介紹此書（14卷「文學紀事」專欄，第10-11頁），一個不署名的評論家對這部中國作品作了很高評價，書評開頭一句是「這是中國的巴爾扎克的小說和創作」。在那個時候巴爾扎克雖然還年輕，但早已從他1829年開始發表的長篇小說《人間喜劇》而成為名噪一時的法國作家。「這部小說獨具一格，使我們傾倒仰慕，贅述它的內容勢將剝奪讀者閱讀時應得的興趣。聖者崇尚兼美，譯本可以說是兩美並焉，巧妙構思令人興味盎然。與此同時，《旅行者》以他的觀察向我們描繪一幅遙遠異國人民的風情習尚的畫面和思想觀念；以及寫景狀物的綿密筆觸都是精美絕倫、真實細膩的。」評論家還寫道：「能不能給我們多提供一點中國的中篇和長篇小說呢？它們確實要比法國的小說更好。我們期待著列昂吉耶夫斯基對這樣的呼聲會作出反應，所有的女讀者在讀了他的譯本《旅行者》之後都和我們有一樣的呼聲。」

這一部在1836年得到如此高評價的小說究竟是一部什麼樣的書呢？而且為什麼評論家單單提出了女讀者，似乎她們就一定喜歡這部小說？我們對冠以這樣書名的一部小說一無所知。但只消讀一讀譯文，就立刻能清楚，這是俄國的漢學家所翻譯的一部中國的戲劇作品，是十三世紀中國劇作家王實甫的雜劇《西廂記》。據我們所知，正是這本劇本，在1710年已經被譯成滿文。²⁰滿文譯本現在還保存在俄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彼得堡分院，莫斯科俄國國家圖書館等處收藏。根據已譯成西方語言的中國文學作品目錄來看，列昂吉耶夫斯基的譯本應是第一個譯成歐洲語言的《西廂記》譯本。日文譯本的出現應在18世紀末，我們知

17.（俄）國立中央歷史檔案館，第44號全宗，第1號目錄，1836年，No.67

18. 王麗娜，《中國古典小說戲曲名著在國外》，上海：學林出版社，1988年，第517頁。

19. M. Davidson, Op. cit., p.149

20. 見M. Volkova編的《滿文刻本記述》，莫斯科，1988第99頁（合璧西廂記）。



道的只是1804年的重刻版本；²¹由著名的漢學家St. Julien（茹林）完成的該劇的法文譯本是直到1872—1880年間才在日內瓦出版的，也就是說幾乎比列昂吉耶夫斯基的譯本晚了將近五十年。²²

但是，列昂吉耶夫斯基的譯本卻不是劇本，而是一部小說，扉頁上就是這樣標明著，而且譯文也確是一部小說的樣式，然而這一部去了曲牌的散文體敘事作品卻與中國的雜劇原本相當地接近。列昂吉耶夫斯基在現存於俄國外交部檔案館的簡短自傳中提到了他曾經翻譯過中國的小說“*Hsihsiang fang*”（西廂房？），然而大家都知道，這部劇作是叫作《西廂記》。俄國的翻譯家在小序裏曾經提到過滿文的譯本書名也是《西廂記》，但俄文譯本的某些細節不禁使人會想到，也許列昂吉耶夫斯基依所據的是另一種和我們現在所知的本子不同的版本或他自己作的一些加工。令人費解的是，例如在俄譯本裏鶯鶯小姐（在俄譯本裏只是簡稱作「鶯」）的婢女不知為什麼不叫紅娘，而名叫作「王」；崔員外生前外室所生之子名曰歡郎，在小說體的譯文裏卻有一個小廝名叫Tao（陶？），據說是崔員外膝下無子，將一貧家孩兒收為螟蛉，扶育栽培，以繼香火；²³張生的書僮，在劇本中原名琴童，但在小說裏卻名為Chin（金？）；再如在劇中張生自稱「本貫西洛人」也應指山西地方，但在小說中卻多次稱張生是籍貫Chinshui（泰水）。

作品的開頭也有異。劇本是從普救寺開場，小說卻一開始就對鶯鶯小姐父親的喪事作了詳細的鋪陳：男客都待在鋪著蒲席的院子裏，女眷們在靈柩四周站立，大家都對寡母孤女好言慰勸；崔老夫人與鶯小姐歛膝而坐，每逢女客前來憑弔，即起身答禮，來客哭靈之時，母女倆人也就放聲慟哭；陶在死者腳邊跪侍，迎送垂哭弔唁的客人；嬖嬖前後忙碌，給女眷端茶送水，閒時就在夫身旁，垂侍聽命。（第五頁）

應該說，如果在譯文中單是地名和人名的差異，那還可以說因為列昂吉耶夫斯基用的是另一種原文版本（譬如說譯者有什麼必要把文中人物的姓名換成另外一個中國人的呢？）。但是最後關於弔喪哭靈的描寫，很可能是完全出於譯者自己的想當然耳，這和中國的這種場景是太不相像了，這一幕倒是更像俄國文學中的場面。還有關於張生對法聰和尚所作的大段關於自己感情的對話，也不能排斥是出諸於列昂吉耶夫斯基之筆：張生對法聰說他愛上了鶯

鶯，但法聰回答說，他不知張生所云為何；法聰在向方丈通報張生來到一事時，也說該生滿口不知所云，方丈於是想親自見張生。在雜劇正文中，張生和法聰交談時的確極言小姐之美，但是絕無一詞涉及法聰對張生所言的不理解。

根據這些我們判斷，俄國譯者很可能依據的是某種小說形式的「西廂記」。但是我查了很多書，也問了很多元曲專家（如吳曉鈴教授等），都未見過小說形式的「西廂記」，也不知為什麼列昂吉耶夫斯基自作主張的把這作品叫作「*Hsihsiang fang*」。應該說在小說的文本中，有不少地方可以感覺到雜劇文本的詩體風格，不管這一散文異體究竟是出於中國作者還是俄國譯者的筆下。「長夜迢迢，閑庭寂靜，重疊的樹蔭影影綽綽；她私心惴惴，悄步而行。唯覺花園里萬籟俱滅，聞然無聲，她憂心忡忡，膽戰心驚，忽聽得耳畔訇然聲響，緊接著一陣窸窣窸窣的腳步聲。原來正是張生跳過粉牆，朝著她急步走近」（第122頁），這一小段，特別是開首的幾句非常像俄羅斯劇本場景，雖然在原文本中僅只紅娘的一小段「甜水令」有過「長夜迢迢，閑庭寂靜」的描寫。王實甫的劇本共五本，二十一折，譯本的文本共分十章，按內容正和劇本的前四本相合。和劇本不同的是小說以張生在赴京城趕考途中的驛店一夢作結，張生應試及第、團圓花燭的情節，在小說裡卻付之闕如。我懷疑列昂吉耶夫斯基譯的小說只是某一位中國人把「西廂記」這個雜劇改成了小說，不是他自己的創作。儘管如此，列昂吉耶夫斯基的高水平的譯述作品，仍使這一中國傑出的戲曲作品在歐洲有了最早的譯本。

至於俄國讀者對中國戲曲更加正式了解，則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三〇年代末期，當時在彼得堡特別暢銷的Senkovskij主編的刊物《讀者叢刊》，在1839年第39卷上曾發表過元代鄭德輝所作的喜劇「鄒梅香」一劇，題為「樊素或機詐的使女」。譯文上有如下的筆注：「該劇是譯者在恰克圖城從漢文逐字譯出，參與此稿翻譯的有邊境翻譯十品文官Razumnik（聰明的人），Artamonov之子Bajbakov（巴伊巴科夫）」。*《俄羅斯通報》*上曾有材料證明，該劇發表曾引起不同的評價，著名的東方語言專家B. Dorn院士對劇本是從中文譯出深信不疑，而*《俄羅斯通報》*則把這個譯本看作是故弄玄虛。寫道：「最飽學之士也有可能鬧笑話，不久前我們就遇到一個十分好笑的例

21. 王麗娜，《中國古典小說戲曲名著在國外》，第468頁。

22. M. Davidson, Op, cit., v.1, p.161

23. “*Puteshestvennik*”（旅行者），中篇小說，俄譯者，Z. Leontievski，聖彼得堡，1835年，第2頁。

子。大家還記得在《讀者叢刊》雜誌上發表一篇說是由巴伊巴科夫似乎是從中文譯出的喜劇麼？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們的學者，著名的東方學家Dorn先生竟會信以為真，在他的一篇論文中把這個偽作的喜劇列入從中文譯出的譯作之列，而把巴伊巴科夫當作我們的漢學家」。²⁴

在Skachkov編的《中國書目》第一版（1932年）裡，這個劇本被歸入「中國文學」欄而不列入「中國文學偽書」一欄；在Glagoleva 1986年所編的《中國古典文學書目索引》中，這一劇本也再次被這樣標明，但Skachkov及其他目錄不解釋到底有無巴伊巴科夫這個漢學家。不管有多麼奇怪，由《俄羅斯通報》的匿名作者和詳實可靠的《筆名辭典》，讓我們找出了躲在名為Bajbakov的邊境翻譯後面的文人，他原來就是《讀者叢刊》主編辛柯夫斯基。²⁵ Baibakov這個筆名的意思與中文的「閒人」差不多（但是沒有那麼文雅，口語俗話），很可能是學漢語的辛柯夫斯基故意用這個筆名。在辛柯夫斯基去世後，於1858年出版的《辛柯夫斯基文集》第一卷中，辛柯夫斯基已發表之著作譯作品表中列入了這個劇本，並有一段文字：「放在中國喜劇框架裡的有關兩個俄羅斯文學家軼事。」²⁶

那麼辛柯夫斯基在《讀者叢刊》上發表的究竟是什麼呢？是中國雜劇的譯本，還是他自己的創作？答案也許有點出乎意料：兩者都是。在辛柯夫斯基劇本發表的五年之前，巴黎“*Journal asiatique*”（亞洲學雜誌）上發表了由巴贊翻譯「鄒梅香」一劇的法譯本，標題為“*Tchao-mei-hiang, ou les intrigues d'une soubrette*”，該劇在1835年出版了法文單行本。²⁷毫無疑問，辛柯夫斯基是借用過該劇譯本的。但是一開頭辛的本子就和中文的原本以及法文的譯本不一樣，只要稍為對照一下出場人物表就可以發現，在辛柯夫斯基的本子裏增加了印書匠蒲拉林，寫書人米拉順等人（順便說說，在漢語裏實際上是很少可能用「拉」或其他「la」來作名字的）。

無庸置疑，辛柯夫斯基並非是單純的從中文翻譯了一個喜劇本子，實際上是一種創造性的加工。正如辛柯夫斯基的妻子在回憶錄中所說的那樣：「他做的遠要比翻譯為

多，他是在對文學作品進行改編，不論是俄國的長篇或中篇的小說，還是翻譯的作品，他都對它們作了大量的改動，當時很多人對這種做法都相當地惱火。」²⁸

辛柯夫斯基確實在元曲中添加了情節線索。劇本開始地方有個楔子，其中寫書人米拉順按中國戲曲慣例出場自報家門：「在下米拉順，別號淡水官人，姓米，名拉順。休管旁人閒話，文章天下第一，真是宏文驚天下，妙筆泣鬼神。目前寫成一書，書名《秦公主》，並已付梓，實乃一大奇書也！」。²⁹接著米拉順就說到滿族出版商蒲拉林因寫書人不曾置酒款待，懷恨在心，竟在一張小報上對該書大肆攻訐云云。當然，從這裡可以看出這一個俄國的作家張冠李戴，元曲的主人公絕不會是一個滿族人，而且在那時根本就沒有一張可以對一部文學作品大肆攻訐的「小報」。為了要在眾人面前把蒲拉林羞辱一番，他還花了二兩銀子僱了一個僮兒，替他捧了一盆泥，他要用金陵之土去糊蒲拉林的嘴巴。

在楔子的二折中，該元曲的真正主人公白敏章出場（應為白敏中），並念了元曲本文中樣的一段道白，但是辛柯夫斯基就是在這裡也擅自加了一些道白，不單是涉及他引入劇中的蒲拉林（蒲還責罵了白敏中，白對蒲也十分痛恨），而且還隨意增加了角色自吹自擂的調子：「我務必，覓得那孔夫子墳墓上的仙草，到那時，可成為普天下第一賢人，明明哲，通文章，捨我其誰！洛圖秘象隨指點，鐘鼎甲骨應手解！」。³⁰顯然，這裡到了神龜獻於伏羲氏的爻象卦圖之類的事。

然後在俄譯本第三齣裡韓夫人出場，她是韓愈的姐姐，自述身世的時候基本上和元曲所寫的內容是一樣的，但辛柯夫斯基在轉述夫人對女兒及樊素的一席話時，卻把它擴充成了整整的一場戲，而且常常通過夫人和樊素之口，加進了作者自己的一些插科打諢的台詞。在元曲中，樊素問道：「問男女授受不親，禮也。（按《孟子·離婁·上·7.17》）。³¹此章正意，為何而說？」韓夫人云：「此章大意，說君子雖則要達權通變」。辛柯夫斯基轉述了這段話，卻作了自己的補充，所據就是《孟子》裡所

24. “*Russkij vestnik*”（俄羅斯通報），1842年，第4期，第28頁。

25. I. Masanov. “*Slovar’ psevdonimov*”，莫斯科，1957年，第1卷，第367頁。

26. “*Sobranie sochinenij Senkovskogo*”，聖彼得堡，1858，第一卷，第123頁。

27. M. Davidson, Op. cit., v.1. p.152

28. A. Senkovskaja, Op.cit., 第76—77頁。

29. 《讀者叢刊》，1839年，第39卷，〈外國文學欄〉，第53—54頁。

30. 同上，第55頁。

31. 此處意思與孟子原文有出入，引原文如下。淳于越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說道的女子溺河，男子應否援手相助的一節：韓夫人說道：「兒啊，齊國之士Hun Yuhuan³²反駁孟聖人。孟子卻說他是禽獸而已，因為全不必違反禮法援手相救溺水之女，君子本可授以柳枝，女子援枝而上，不亦得救乎？」³³辛柯夫斯基主要的創新當然也不在個別的詞句方面，而在整個的情節線索上。

米拉順在路上與白敏章相遇，聯襟進京，這在元曲裡稱作西京（在法文譯本裡亦然），但辛柯夫斯基不知什麼道理卻稱之為東京。他們希望在那裡能遇到他們的公敵蒲拉明，蒲也進了京城並把米拉順的《秦公主》一書，獻給了韓夫人，韓夫人以為此書是蒲拉明所寫，故對他大加青睞。蒲見了夫人之女小蠻，心嚮往之，乃遣人求親。米拉順趕到韓夫人府邸之時，正值蒲拉明在，蒲乃誣米為瘋子，專以冒充天下妙文之作者為能事。韓夫人應允將女兒許配予蒲拉明，條件是他必須在京試時得中，夫人以為蒲滿腹經綸，學富五車，此事於他真是易如反掌，但事實不然。如元曲所說，考試的結果白敏章（白敏中）得中狀元，這一個名字在夫人的府上引起一場爭端，夫人遵照已故丈夫的遺命，同意把女兒許配給姓白的書生為妻，樊素嫁給了米拉順。而相爺李鑑則命令將蒲拉林釘在橛子上處死（這是一種完全不是中國式的歐洲古刑），使米拉順便於用黃泥巴糊在他口中。顯而易見，我們見到的是對中國古代戲曲的一種創造性的、文學上成功的再加工，它實在也是十九世紀俄羅斯的文學事實，是兩國文學關係的結果。但是可以說俄國與中國文學關係的初期與西方（法國與英國）漢學是分不開的。

上面介紹的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上半葉時期的中國小說、戲曲，在俄國也要補幾句話關於中國的詩歌。1983年，莫斯科東方研究所I. Lisevich教授發現了《中國書目》未記載的俄國最早發表的中國民歌。原來1793年，在莫斯

科出的雜誌，題為“*Chtenie dlja vkusa rasuma i chuvstvovaniya*”（味、智、情而讀物）發表了〈中國之歌〉的原文拼音字及俄文翻譯。短序說，這個翻譯是在18世紀初作的而歌詞是17世紀編的，一看是典型的民歌，從拼音譯成漢字全文是：「從南來了一羣雁，也有成雙的，也有孤單，成雙雁咪咪唱，聲嘹亮，孤單雁留在後頭飛不上。不看成雙只看孤單，也是與吾的淒涼一般樣。」這個民歌誰帶來的，誰直接從中文譯成俄文的我不知道，要注意的是18世紀初年俄國沒有人蒐集自己的民歌，因此有人紀錄、翻譯中國的民歌是很不平常的事。後來19世紀上半葉也有俄國的雜誌偶然發表中國詩歌幾首，但是都是從法文譯的，如1800年*Ipokrena*雜誌（第4卷第36期）發表了P. Lvov用散文譯的幾首中國詩，其中一個是司馬光描寫燕的作品，原文是否為詩，待考；另一個雜誌“*Journal drevnej i novoj Slovesnosti*”（古今文學雜誌）1819年發表了V. Olin從法文的書“*Choix des lettres édifiantes écrit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譯的三首詩，其中一首題為「牧羊女」很像民歌，因我手中無此法文的書，也查不到原文。但只應該說十八世末十九世紀上半葉（也可以說到二十世紀初）俄國很少介紹中國的詩歌，原因可能是因為翻譯詩歌比小說還困難，特別如通過西方語言轉譯就全丟了中國詩歌的味道。

當然今天我們在俄國有不少從中文譯的小說、詩歌、戲曲，莫斯科正在出版「中國文學叢書」40卷本，但是這是另一個題目。這篇文章的目的是初步講俄國怎麼開始介紹中國文學及當時的翻譯工作與歐洲漢學之關係，可見雖然很多作品是從法文或英文轉譯的，也有俄國漢學家直接由中文翻譯的，如〈好逑傳〉、《紅樓夢》片段及《西廂記》的改本，後兩個作品，在當時的西歐是尚未翻譯的。

32. 不知為何Senkovskij把「孟子」中的淳于越改成Hun Yuhuan，可能是把淳于越的淳念錯了。

33. 《讀者叢刊》，1839年，第39卷，〈外國文學欄〉，第60頁。